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Distr.: General
12 December 202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禁止酷刑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通过的关于第 1109/2021 号来文的决定***

来文提交人: Safa Turhan(由律师 Ali Yildiz 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缔约国: 瑞典

申诉日期: 2021 年 11 月 22 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14 和第 115 条作出的决定, 已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决定通过日期: 2024 年 11 月 8 日

事由: 将志愿服务运动/居伦运动/费特胡拉恐怖组织成员递解至科索沃, 以及可能将其转移到土耳其

程序性问题: 申诉证实程度

实质性问题: 不驱回; 难民地位; 酷刑

《公约》条款: 第 3 条

1.1 申诉人 Safa Turhan 系土耳其国民, 生于 1995 年。他声称, 缔约国如果将他递解至科索沃将侵犯他们根据《公约》第 3 条享有的权利,¹ 因为他在科索沃极有可能被驱逐或被非法移解至土耳其, 并在土耳其遭受酷刑。缔约国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1 款发表了声明, 自 1987 年 6 月 26 日起生效。提交人由律师代理。

* 委员会第八十一届会议(2024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22 日)通过。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 托德·布赫瓦尔德、豪尔赫·孔泰斯、克劳德·埃莱尔、彼得·韦泽尔·凯辛、柳华文、前田直子、阿娜·拉库、阿卜杜勒-拉扎克·卢瓦内。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09 条(结合第 15 条一并解读)以及《人权条约机构成员独立性和公正性准则》(《亚的斯亚贝巴准则》)第 10 段, 埃尔多安·伊什詹没有参加对来文的审查。

¹ 提及科索沃时, 应结合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加以理解。



1.2 2021 年 12 月 7 日，委员会通过新申诉和临时措施特别报告员行事，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14 条发出临时措施请求，请缔约国在委员会审议本来文期间暂停将申诉人递解至科索沃。

事实背景

2.1 2013 年，申诉人前往斯里兰卡接受大学教育，并在一个与志愿服务运动/居伦运动有关的组织担任志愿者。² 据申诉人称，土耳其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对他和居住在斯里兰卡的志愿服务运动/居伦运动其他成员进行了监视，将他们的姓名和护照信息泄露给斯里兰卡媒体，并诽谤他们为恐怖分子。³

2.2 2016 年 6 月，申诉人搬到科索沃，在科索沃 Gülistan 教育机构旗下的两所学校担任英语教师，⁴ 该机构位于科索沃，与志愿服务运动/居伦运动有联系。他声称，土耳其政府将 Gülistan 教育机构列为恐怖组织。据他称，2016 年 12 月 21 日，土耳其驻科索沃大使馆向土耳其的安全部门发送了一封电报，声称 78 名居住在科索沃的人(申诉人的名字不在其列)隶属于恐怖组织，并提供了他们住所和工作地址。2018 年 3 月 29 日，大使馆所发送名单中的六个人在科索沃被土耳其情报部门绑架，并被强行转移到土耳其，在土耳其遭到监禁和虐待。在转移行动后，安卡拉检察院对这六人进行了调查，作为恐怖主义调查的一部分。⁵

2.3 2018 年 8 月 8 日，一名土耳其律师证明，土耳其已经对申诉人签发了逮捕令，且正在根据反恐法律条款(《刑法》第 314(2)条，武装组织成员)对申诉人进行刑事调查，以查明他与志愿服务运动/居伦运动的联系。⁶ 在一封未注明日期的信中，一名科索沃律师解释说，科索沃对申诉人来说不是一个安全的国家，这名律师曾代表过一名土耳其国民，土耳其因其与志愿服务运动/居伦运动的联系而要求引渡该土耳其国民。⁷ 申诉人还获得了土耳其护照服务局于 2019 年 7 月 2 日签发的电子证明，证实他的土耳其护照已被注销。⁸ 由于压力越来越大，申诉人于 2020 年 9 月从科索沃移居瑞典。

2.4 2020 年 9 月 24 日，申诉人提出庇护申请。2021 年 2 月 8 日，瑞典移民局驳回了他的申请。移民局指出，申诉人在 2017 年被家人告知土耳其警方正在寻找他时，在 2018 年对他发出逮捕令后，或 2019 年在斯里兰卡公布有他姓名在列的费特胡拉恐怖组织成员名单时，都没有在科索沃申请庇护。至于具体的指控，包

² 志愿服务运动/居伦运动，又称 Cemaat，据称以居住在美国合众国并于 2024 年 10 月 20 日在此逝世的土耳其穆斯林传教士费特胡拉·居伦的思想为基础。在土耳其，它被称为费特胡拉恐怖组织。

³ 见 <https://nordicmonitor.com/2019/07/turkish-embassy-spying-in-sri-lanka-exposed-with-a-leak-of-names-of-critics>.

⁴ 2016 年 6 月至 2020 年 9 月。他提供了两所 Gülistan 教育机构出具的就业证明。

⁵ 见 <https://nordicmonitor.com/2020/07/erdogan-critics-kidnapped-by-turkish-intelligence-in-kosovo-included-in-terrorism-indictment>。这六人是 Kahraman Demirez、Mustafa Erdem、Hasan Hüseyin Günakan、Yusuf Karabina、Osman Karakaya 和 Cihan Özkan。

⁶ 在档，为土耳其语。

⁷ 已存档。

⁸ 已存档。

括一名土耳其律师关于逮捕令的陈述，移民局认为，在审查他的案件时，移民局考虑的不是与土耳其或斯里兰卡的关系，而是与科索沃的关系。

2.5 移民局指出，申诉人在科索沃的四年中没有受到个人或政府部门的迫害。接着移民局审查了他关于返回科索沃后有可能被送往土耳其的说法。移民局认为，一名科索沃律师关于申诉人作为志愿服务运动/居伦运动的支持者所面临风险的陈述作为证据价值有限，因为这只是律师的个人意见。移民局注意到申诉人以文章、报道和视频剪辑的形式提供的关于土耳其公民从科索沃被递解至土耳其的证据，但认为这些文件无法与申诉人本人关联，而且这些文件本身并不能可靠地证明申诉人返回科索沃后有被送回土耳其的风险。

2.6 关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六名土耳其公民从科索沃被递解至土耳其，移民局承认，在 Gülistan 教育机构工作的人从科索沃被递解至土耳其的事实可能表明，申诉人如果返回科索沃，也可能面临被送往土耳其的风险。但移民局注意到，根据人权理事会的一份报告，科索沃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出台了一项新的庇护法，加强了不推回原则，并保证弱势寻求庇护者将得到保护。⁹ 此外，移民局指出，当这六名土耳其公民被递解至土耳其时，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报道，对这一事件还开展了若干调查，结果参与此行动的 22 名警官遭到起诉。¹⁰

2.7 移民局认为，这些情况表明，科索沃执法当局认定，将这六名土耳其公民递解出境违反了科索沃的法律。不推回原则的加强也表明，科索沃主管部门已采取行动，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因此，移民局得出结论认为，情况表明，申诉人如果返回科索沃，不会有被送回土耳其的风险。移民局认为，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情况是，申诉人在 2018 年 3 月 29 日事件后在科索沃生活了两年多，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申诉人在此期间在科索沃需要隐居。

2.8 移民局指出，虽然科索沃没有加入《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51 年《公约》)，但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声称，科索沃为难民提供保护，不符合难民资格的人得到补充保护。¹¹ 欧盟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也指出，司法庇护框架基本上遵循了欧盟的规定，存在管理庇护申请的机构，但需要予以加强以应对能力方面的不足，而且 2019 年通过了重要的立法改革，包括一项关于外国人融入的法规。¹² 移民局注意到科索沃的庇护制度存在一些缺陷，但考虑到关于原籍国的资料，移民局得出结论认为，申诉人可以在科索沃申请庇护。移民局还认为，申诉人与科索沃的联系比与瑞典的联系更紧密，因为他在该国合法居住了若干年，有自己的家，后来又在那里工作。

2.9 申诉人提出上诉，特别声称，科索沃公共机关在 2018 年 3 月 29 日事件后采取了措施并通过了新的移民立法，这些事项与本案无关，因为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措施产生了效果。据他说，他能够在科索沃自由生活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被强行遣返土耳其的危险。土耳其主管部门非常希望找到可能与 2016 年未遂政变有关的

⁹ A/HRC/40/59/Add.1, 第 92 段。

¹⁰ 未提供进一步细节。

¹¹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2/KOSOVO-2019-HUMAN-RIGHTS-REPORT.pdf>, 第 16 和第 17 页。

¹² https://neighbourhood-enlargement.ec.europa.eu/system/files/2020-10/kosovo_report_2020.pdf, 第 48 页。

人，而他们对科索沃当局和政治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一点众所周知，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中也有所阐述。¹³ 申诉人还指出，就在 2021 年 2 月，政府向科索沃议会提交了一项提案，要求将志愿服务运动/居伦运动列为恐怖组织。他的土耳其护照已被吊销，他没有留在科索沃的合法权利。

2.10 2021 年 4 月 23 日，斯德哥尔摩行政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法院尤其认为，尽管他的同事在类似情况下被拘留，但没有客观证据支持申诉人面临同样待遇风险的说法。法院考虑到，申诉人在科索沃居住的四年中没有遭受任何可构成保护理由的待遇，而且该国针对他的同事被拘留的事件采取了广泛措施。法院虽然没有质疑申诉人的说法，即那些可以证明自己是志愿服务运动/居伦运动成员的人有可能在土耳其遭受可构成保护理由的待遇，但法院回顾说，申诉人在事件发生后在科索沃呆了两年多，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科索沃主管机构认真对待了这一事件并实施了更严格的立法，该事件对涉案人员产生了法律影响。法院得出结论认为，没有客观证据表明土耳其主管部门对申诉人有如此大的兴趣，以至于在他的同事被递解大约三年之后，他们还会有意愿或能力对他采取违反科索沃法律的同样行动。

2.11 行政法院注意到申诉人的解释，即他曾经持有允许他在科索沃工作的临时居留许可，但该许可已于 2021 年 2 月到期，在延长其许可的可能性方面存在困难和不确定性。然而，法院认为没有理由更改瑞典移民局关于申诉人可以在科索沃申请庇护的评估。法院还认同移民局的评估，即申诉人曾在科索沃合法生活、工作和学习多年，与科索沃有联系，因此他前往科索沃是合理的，虽然他在那里没有亲属。

2.12 2021 年 6 月 29 日，移民上诉法院拒绝给予上诉许可。

2.13 申诉人因担心被遣返科索沃而遭受心理创伤。根据 2021 年 6 月 10 日的医疗证明，他患有混合性焦虑和抑郁障碍。2021 年 8 月 24 日的另一份证明提到了自杀念头，2021 年 9 月 17 日至 24 日，他被送入医院以防止自杀。

申诉

3.1 申诉人认为，缔约国将他驱逐到科索沃将侵犯他根据《公约》第 3 条享有的权利，因为他是志愿服务运动/居伦运动的成员，在科索沃极有可能遭到驱逐或被非法移解至土耳其。在土耳其，申诉人很可能遭到任意监禁和酷刑。

3.2 申诉人认为，国内主管部门错误地将科索沃认定为可以将他遣返的安全第三国。事实上，土耳其政府在科索沃有很大的影响力。2021 年 2 月，由于土耳其对科索沃政府不断施压，科索沃区域发展部长要求科索沃政府正式将志愿服务运动/居伦运动定性为恐怖组织。他表示，加强与土耳其的合作将使科索沃获益。据媒体报道，时任科索沃总理将区域发展部长的请求转交科索沃情报局审查。¹⁴ 因此，科索沃可能随时将志愿服务运动/居伦运动定性为恐怖组织，然后将申诉人引渡到土耳其。这既非遥远的风险，也非想象中的风险，而是极有可能发生的对

¹³ 未提供具体参考文件。

¹⁴ 见 <https://www.aa.com.tr/en/europe/kosovo-minister-wants-feto-pkk-pyd-labeled-terrorists/2150030>。

申诉人权利、自由和福祉的实际威胁。在以前的若干案件中，委员会认定，摩洛哥将三人引渡到土耳其将侵犯他们根据《公约》第 3 条享有的权利。¹⁵

3.3 如上所述，六人中有五人是申诉人的同事，他们被绑架并被强行转移到土耳其，并在土耳其遭到监禁。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认定，对他们的监禁是非法和任意的。¹⁶ 土耳其政府最近提出的将个人法外移交其管辖的请求有所增加。2021 年 5 月以来，已发生两起类似事件。土耳其无视法院命令，将美国合法居民 Selahattin Gülen 从肯尼亚非法转移到土耳其。Orhan İnandi 是一名教师，拥有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双重国籍，他在吉尔吉斯斯坦被绑架并被转移到土耳其。此外，科索沃不是《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欧洲人权公约》）、《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缔约国。过去，科索沃没有遵守不推回原则。

3.4 申诉人解释说，在 2016 年 7 月 15 日的未遂政变后，土耳其政府宣布进入为期两年的紧急状态。他指称，政府援引紧急状态作为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笼统借口。在此期间，政府颁布了 32 项法令，其中 3 项(第 667 号、第 668 号和第 696 号)规定，公务员和平民为制止未遂政变或恐怖主义行为而实施的任何行为均可完全不受惩罚。根据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特别报告员 2017 年发表的关于访问土耳其的报告，“尽管在 2016 年 7 月 15 日政变失败后不久，以及在该国东南部暴力升级的情况下，不断有指控称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普遍存在，但对这类指控的正式调查和起诉似乎极为罕见，从而使人强烈地感觉到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行为事实上不受惩罚”。¹⁷ 申诉人援引了国际机制和组织发表的其他报告，以支持关于土耳其境内发生了酷刑和虐待事件的说法。¹⁸

3.5 申诉人还提到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移民人权特别报告员、反恐中注意促进与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特别报告员、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特别报告员于 2020 年 5 月 5 日向土耳其发出的一封指控函。¹⁹ 根据指控函，作为秘密行动的一部分，至少有 100 名涉嫌参与志愿服务运动/居伦运动的人遭到任意逮捕和拘留、强迫失踪和酷刑，据称这是土耳其政府在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柬埔寨、加蓬、科索沃、哈萨克斯坦、黎巴嫩、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主管部门配合下组织或教唆实施的。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

4.1 2022 年 6 月 20 日，缔约国通知委员会，庇护诉讼之后，申诉人以存在妨碍执行驱逐令的障碍为由申请了居留许可。他维持了之前在庇护请求中引用的理

¹⁵ Erdoğan 诉摩洛哥(CAT/C/66/D/827/2017); Onder 诉摩洛哥(CAT/C/66/D/845/2017); Ayden 诉摩洛哥(CAT/C/66/D/846/2017)。

¹⁶ 见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 47/2020 号意见。

¹⁷ A/HRC/37/50/Add.1, 第 23 段。

¹⁸ 例如见，欧洲委员会，“向土耳其政府提交的关于欧洲防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委员会 2017 年 5 月 10 日至 23 日访问土耳其的报告”（斯特拉斯堡，2020 年）。

¹⁹ 见 TUR 5/2020 号来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209>。

由，并补充说，他患有精神疾病，并且由于他不是科索沃公民并且没有护照，因此执行存在实际障碍。该申请仍在瑞典移民局待审。²⁰

4.2 接着缔约国对申诉的可受理性提出质疑，认为申诉没有达到证实程度的最低标准，因而明显缺乏根据。

4.3 关于案情，缔约国澄清说，申诉人在提交委员会的来文中主要侧重于他在土耳其需要保护的申诉以及土耳其的一般人权状况。但瑞典移民当局没有审查申诉人涉及土耳其的庇护申请。因此，如果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来文可以受理，缔约国认为委员会需要处理的问题是将申诉人强行遣返作为安全第三国的科索沃是否构成违反《公约》第3条的行为。

4.4 缔约国提出，虽然科索沃不是联合国或欧洲委员会的成员，因此没有被邀请批准根据这些组织章程起草的公约，但在其《宪法》第22条中，科索沃承诺单方面保证《公约》，以及《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欧洲人权公约》及其议定书可直接适用，且优先于法律规定和公共机构的其他法令。国家庇护法还规定，可以根据难民或辅助保护给予庇护，并明确禁止驱逐或遣返(不推回)。目前其法律框架原则上符合欧洲联盟文书。

4.5 缔约国接着提及国内法院的裁决，认为没有理由认定这些裁决不当，或国内程序的结果具有任何任意性或构成司法不公。申诉人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明他在科索沃曾受制于土耳其主管部门的任何措施。

4.6 缔约国指出，虽然申诉人向委员会声称科索沃将在不久的将来将志愿服务运动/居伦运动定性为恐怖组织，但科索沃主管部门尚未做出这样的决定。缔约国还指出，虽然申诉人声称他在科索沃居住期间成为土耳其大使馆的目标，但他在来文中没有进一步证实这一说法。

申诉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的评论

5.1 申诉人在2022年7月7日的评论中指出，土耳其政府继续利用对他国政府的影响力，通过各种外交途径提出引渡请求。²¹ 据他说，土耳其最近迫使缔约国签署一项关于引渡居住在瑞典的土耳其公民的备忘录，以换取取消对缔约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否决权。²² 申诉人指出，根据备忘录，缔约国承诺不向土耳其境内被称为费特胡拉恐怖组织的组织提供支持，考虑到土耳其提供的资料、证据和情报，迅速彻底地处理土耳其提出的遣返或引渡恐怖主义嫌疑人的待决请求，并建立必要的双边法律框架，为引渡行动和与土耳其的安全合作提供便利。对申诉人而言，这一进展证明了他的关切，即土耳其对科索沃有着优势和影响力，因此科索沃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安全国家。事实上，2022年6月19日，土

²⁰ 缔约国没有质疑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已经用尽这一事实。

²¹ 未提供具体参考文件。

²² 见 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2/6/pdf/220628-trilat-memo.pdf.
另见 <https://www.aa.com.tr/en/world/sweden-finland-turned-back-most-of-turkiyes-requests-for-terrorist-extraditions-over-last-5-years/2589502>.

土耳其外交部长表示，土耳其支持科索沃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强调科索沃境内有费特胡拉恐怖组织成员是科索沃申请加入北约的最大障碍。²³

5.2 申诉人然后声称，在上述 Selahattin Gülen 和 Orhan İnandi 被绑架之后，两名受害者在秘密监狱遭受了数日的酷刑。这些事件表明，土耳其政府甚至可以绑架其他国家的国民或合法居民。因此，尽管缔约国认为，申诉人在科索沃将是安全的，但如果他被遣返科索沃，他将始终生活在可能被移交给土耳其的恐惧之中。使申诉人陷入这种恐惧相当于一种酷刑。

5.3 此外，2018年3月向土耳其的移交行动是在当地官员的共谋下开展的，尽管科索沃首席特别检察官已拒绝对有关个人的引渡请求。因此，真正令人关切的不是法律或任何保证，而是它们的执行情况，包括土耳其政府拥有的权力和影响力对执行情况产生的影响。

5.4 志愿服务运动/居伦运动成员被土耳其驻科索沃大使馆谴责为恐怖分子，并受到土耳其情报人员的监视。土耳其政府持续对科索沃政府施加外交压力。例如，2021年12月，土耳其国防部长访问科索沃，要求政府官员逮捕并引渡所有居住在科索沃的志愿服务运动/居伦运动成员。2022年3月1日，在科索沃总统访问安卡拉期间，埃尔多安总统表示，消灭费特胡拉恐怖组织极为重要，该组织对土耳其的民主产生了威胁，并邪恶地杀害了251名土耳其国民。埃尔多安总统向科索沃总统表示，土耳其政府希望看到基于友好的兄弟关系采取的某些措施。在此次访问中，土耳其的一名议员呼吁科索沃对土耳其打击费特胡拉恐怖组织予以支持。他说，在土耳其犯下罪行的个人不应在友好的兄弟国家受到保护。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委员会必须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第22条规定的受理条件。按照《公约》第22条第5款(a)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项过去和现在均未受到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

6.2 根据《公约》第22条第5款(b)项，除非能够断定个人已用尽一切国内补救办法，否则委员会不应审议其提交的任何来文。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案中缔约国没有对申诉人已用尽一切国内补救办法提出异议。因此，委员会认为《公约》第22条第5款(b)项的规定不妨碍委员会审议本来文。

6.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对申诉人根据第3条提出的申诉的可受理性提出质疑，理由是这些申诉明显没有根据，因为申诉人未能证实存在充分理由相信如果他被遣返回科索沃，将面临可预见、现实存在、针对个人和真实的酷刑风险。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的主张，即如果被遣返科索沃，他将一直生活在担心被绑架并被带回土耳其的恐惧之中，这种安全感的缺失和由此产生的持续恐惧相当于遭受酷刑，而且他已经因害怕被驱逐到科索沃而遭受心理创伤。委员会认为，申诉人已经提供了证据证明他因害怕被遣返科索沃而遭受心理创伤。然而，这些证据并

²³ <https://www.koha.net/en/lajmet-e-mbremjes-ktv/cavusoglu-gulenistet-pengese-ne-raportet-mes-kosoves-dhe-turqise> 和 <https://sot.com.al/aktualitet/turqia-mbeshtet-kosoven-ne-nato-avusoglu-ne-prishtine-kerkon-goditjen-i520808/> (阿尔巴尼亚文)。

不能证实申诉人关于他的恐惧构成《公约》所界定的酷刑的说法。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基于在科索沃遭受酷刑的这一论点的申诉不可受理。²⁴

6.4 委员会还注意到，申诉人称如果被遣返科索沃，他随后被转移到土耳其并在土耳其遭受酷刑的风险很高，因此缔约国将他遣返科索沃将违反根据《公约》第 3 条承担的义务。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认为，瑞典移民主管部门没有审查申诉人涉及土耳其的庇护申请，因此，委员会需要处理的问题是，将申诉人强行遣返作为安全第三国的科索沃是否构成违反《公约》第 3 条的行为。在这方面，委员会提及其第 4 号一般性意见(2017 年)，其中委员会指出，根据第 3 条，若个人面临风险者在被递解至另一国家后会随之面临被递解至有充分理由相信此人将有遭受酷刑危险的第三国，绝不得予以递解。²⁵ 因此，委员会认为，申诉的这一部分以及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论点涉及《公约》第 3 条下的实质问题，应根据案情审查这些问题。委员会认为在受理方面不存在其他障碍，因此宣布来文可予受理，并着手审议实质问题。

审议实质问题

7.1 委员会依照《公约》第 22 条第 4 款，参照当事各方提供的所有材料审议了本来文。

7.2 委员会认为，申诉人根据《公约》第 3 条提出的申诉要求委员会评估两个不同的问题。委员会必须首先确定是否有充分理由相信，如果申诉人被遣返土耳其，他们将面临真实、针对个人、现实存在而且可预见的遭受酷刑的风险。在评估这一风险时，委员会必须根据《公约》第 3 条第 2 款考虑到所有相关因素。其次，委员会必须确定，申诉人如果被缔约国递解至科索沃，是否会面临随后被强行遣返土耳其的风险。²⁶

7.3 委员会回顾，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举证责任由申诉人承担，申诉人必须就上述风险提出可以论证的理由。²⁷ 然而，当申诉人无法就其案件提供详细资料时，则应倒置举证责任，所涉缔约国须对指称进行调查并核实申诉所依据的信息。²⁸ 委员会还回顾，委员会相当重视所涉缔约国机关的事实调查结论；但不受这种结论的约束。因此，委员会需要依据每一案件的所有相关情况，对所掌握的资料作出评估。²⁹

土耳其的酷刑风险

7.4 关于申诉人是否已证明有充分理由相信，如果他被迫遣返土耳其，将面临针对个人、真实、现实存在而且可预见的遭受酷刑的风险，委员会首先注意到，

²⁴ X 和 Y 诉瑞士(CAT/C/75/D/1081/2021)，第 6.4 段。

²⁵ 第 12 段。就本一般性意见而言，第 4 段将“递解出境”一词界定为包括但不限于将个人或群体从一缔约国驱逐、引渡、强制遣返、强行移交、移解至另一国及在边境拒绝其入境，以及涉及个人或群体的驱回(包括在海上驱回)行动。

²⁶ X 和 Y 诉瑞士，第 7.2 段。

²⁷ 第 4 号一般性意见(2017 年)，第 38 段；T.A.诉瑞士(CAT/C/73/D/914/2019)，第 8.5 段；以及 E.T.诉荷兰(CAT/C/65/D/801/2017)，第 7.5 段。

²⁸ 第 4 号一般性意见(2017 年)，第 38 段。

²⁹ 同上，第 50 段。

缔约国没有对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申诉提出异议。委员会还注意到，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以 2016 年 7 月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后所开展调查为基础的一份报告，被拘留者遭受了各种形式的酷刑和虐待，包括殴打、性侵犯、电击和模拟溺水，通常是为了逼取口供或对他人不利的信息，而且另一个特点是，如果政府认定某些人是与恐怖组织有关联的主要嫌疑人，他们的妻子会被当作同伙一起被拘留。³⁰ 委员会还注意到，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在 2016 年访问土耳其后发表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使用酷刑的情况在未遂政变后普遍存在，并指出许多对话者提到，根据官方记录，一些被怀疑与志愿服务运动/居伦运动有关联的被拘留者在拘留期间自杀，尽管独立尸检并未证实死因是自杀。³¹ 特别报告员还指出，针对酷刑或虐待指控启动的调查和起诉数量很少，似乎与侵犯人权行为的发生频率极不相称，这表明有关当局并未对这些指控进行充分调查。³² 委员会还注意到，最近有报告称：2021 年很少有酷刑指控受到起诉；有罪不罚的文化仍然普遍存在；绑架和强迫失踪事件仍有报道，但未得到妥善调查；失踪时间最长的是据称参与了志愿服务运动/居伦运动的人。³³ 因此，委员会认为，申诉人如果被转移到土耳其，将面临针对个人、真实、现实存在而且可预见的遭受酷刑的风险。

从科索沃被递解或被强行转移到土耳其的风险

7.5 在评估申诉人从科索沃被强行遣返土耳其的风险时，委员会首先注意到，2018 年 3 月，与申诉人一样隶属于志愿服务运动/居伦运动的六人被非法转移到土耳其，据报道，他们在土耳其被送上法庭，并被指控犯有国际恐怖主义和间谍罪。委员会注意到，科索沃政府多名官员随后宣布，移交这六人违反了国内法和国际法，并采取了若干措施追究该事件的责任。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的土耳其护照已被注销，科索沃的一名律师声称，科索沃对申诉人来说不是一个安全的国家(见第 2.3 段)。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当局的立场，即情况表明，申诉人如果返回科索沃，不会有被送往土耳其的风险，而且他可以在科索沃申请庇护。

7.6 委员会随后注意到，申诉人在科索沃的临时居留证于 2021 年 2 月到期，他在科索沃没有难民身份。委员会注意到，虽然申诉人本身并未被列入土耳其驻科索沃大使馆发给土耳其安全官员的电报中列出的 78 人名单，但他是上述五人的同事，他们均在被土耳其政府列为恐怖组织的 *Gülistan* 教育机构旗下的学校担任教师，因此与志愿服务运动/居伦运动有关联。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科索沃议会中提议取缔该运动的政府提案。

7.7 委员会已对下列指控表示关切：土耳其与包括科索沃在内的若干国家的主管部门协调，系统地对据称与志愿服务运动/居伦运动有联系的人实施国家支持的域外绑架和强制返回。³⁴ 因此委员会促请土耳其停止一切法外引渡和移解，包

³⁰ “关于紧急状态对土耳其人权的影响的报告，包括东南部的最新情况：2017 年 1 月至 12 月”(2018 年 3 月)，第 77 和第 78 段。

³¹ [A/HRC/37/50/Add.1](#)，第 95 段。

³² 同上，第 70-73 段。

³³ [CCPR/C/TUR/CO/2](#)，第 25 和 27 段。

³⁴ [CAT/C/TUR/CO/5](#)，第 26 段。

括对被认为或实际上与志愿服务运动/居伦运动有联系的人和以反恐为借口的引渡和移解。³⁵

7.8 委员会还强调，科索沃不是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或任何区域或国际人权公约的缔约国。因此，根据国际法，科索沃不受《禁止酷刑公约》第 3 条的约束(不得将申诉人转移到有遭受酷刑危险的国家)的约束，也不受《公约》任何其他条款的约束。在这方面，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在关于将上述六人非法转移到土耳其的意见中指出，科索沃政府没有应工作组的要求提供关于这六人情况的资料，也没有解释将他们强行逮捕并移交给土耳其所依据的法律条款，以及这些行动是否符合科索沃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³⁶

7.9 鉴于上述考虑，委员会认为，可以预见的是，如果申诉人现在被遣返科索沃，他将面临从科索沃被转移到土耳其的真实风险。

8. 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7 款行事，认定缔约国如将申诉人遣返科索沃将违反《公约》第 3 条，因为申诉人在科索沃将面临被强行转移到土耳其并遭受酷刑的真实风险。³⁷

9. 委员会认为，根据《公约》第 3 条，缔约国有义务不将申诉人强行遣返科索沃。

10. 委员会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118 条第 5 款，请缔约国自本决定送交之日起 90 天内通报根据上述意见所采取的措施。

³⁵ 同上，第 27 段。

³⁶ 第 2020/47 号意见，第 38 和第 39 段。

³⁷ X 和 Y 诉瑞士，第 8 段。